

试论救灾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嬗变

刘建民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救灾思想独具特色,以独特视角反映着近代社会和思想变迁的复杂历程。近代救灾思想孕育、传承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语境,但在近代的大变局中又陷入了某种困境,被迫开始了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演变。这种“被迫演变”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中,又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主动性,表现在救灾认识、救灾主体、救灾措施等皆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新陈代谢,救灾思想在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思考中开始了缓慢但意义深远的嬗变。也就是说,近代救灾思想基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理论与实践的碰撞和交融之中,从救灾层面如何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思考,在近代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中书写了独特气质的篇章。

关键词: 救灾思想;近代中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7-0132-08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变化莫测,自然灾害多发,“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西历纪元前一七六六年(商汤十八年)至纪元后一九三七年止,计三七〇三年间,共达五二五八次,平均约每六个月强便有灾荒一次”^[1]。因此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救灾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施加了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持续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然灾害的频度与程度不断增加和强化,相互叠加而产生的同频共振效应使得救灾思想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近代以来(为了问题讨论的方便,本文将时间限定在鸦片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但视野自然不受此限制),本已动荡的政治、经济、社会与西方列强的入侵纠缠在一起,这种复杂局面既影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冲击,又对救灾思想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以往研究多关注于荒政制度、赈灾活动、代表性人物分析等方面,对社会变迁中救灾思想的嬗变关注较少^①。因此,

本文立足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与思想嬗变的宏观视野,对近代社会转型中救灾思想的传承与变化等问题进行讨论。

一、传统救灾思想的惯性与困境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演变中,自然灾害暴发及如何救灾是其中不容回避的重要内容,并在岁月的沉淀中形成了具有独特标识的文化符号。但是,救灾思想在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中遇到了新挑战,其张力主要来自西方思潮的冲击与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正因如此,随着社会从原来封建的独奏逐渐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双重变奏,救灾思想“进入”一种巨大惯性与复杂困境并存的状态,面临着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境中以变应变的挑战。

1. 传统救灾思想的惯性

说到救灾思想,必然会涉及一个前提性的概念或现象,即何为自然灾害?这其实是传统社会中

收稿日期:2025-02-03

作者简介:刘建民,男,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河北石家庄 050024)。

“困扰”人们已久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正是因为受时代与知识所限,对超乎认识与理解范畴的自然灾害,人们往往将其与敬畏有加的“天”联系在一起。“天”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存在,有着巨大力量,人们在无力与无奈中逐渐以阴阳五行来解释自然灾害,认为自然灾害是“天”(神)意志的具象化,具有警示、劝善、惩戒的政治作用。这种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想和有意虚设,导致人们的思想认识陷入封建迷信、麻木不仁的境况。进而言之,天变与人事相联系,“天象示警”成为灾害频仍、政治动荡、社会失序的隐喻,并在“天子”(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有意为之下日益固化。董仲舒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2]之语,实则是将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人们的应对、灾害的影响建构了一个逻辑关系,并借助权力系统与话语优势演变成一种“共识”,在王朝循环中反映着人类、社会、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

自然灾害以及防灾救灾被赋予的政治蕴意,其实是王朝统治初期的君权合法性及其后君权警戒的内在逻辑,这也使得自然灾害在特定情境下往往从“灾难”向“天意”发生转变,凸显出其“教育”或“教化”的功能。王朝更迭,文化交融,清朝建立后,传统救灾思想被其迅速接受并成为其统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如康熙在位期间,史料记载有50个年份他都进行了祈雨活动,曾因亢旱,于“宫中设坛祈祷。长跪三昼夜,日惟淡食,不御盐酱。至第四日,步诣天坛虔祷”^{[3]531}。在其后继者中,此类行为也属“惯例”,特别是在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具有“罪己诏”性质的谕旨中不乏“深刻”的“请罪”之语:“上天降罚,何不移于宫廷以免民生之厄?”^{[3]552}统治集团内部对此也深以为然,张佩纶在向朝廷上奏时也表达了类似观念:“所以遇灾恐惧终致福应者,其要有四:首曰诚祈,集议次之,恤民次之,而省刑终焉。”^{[3]530}在救灾的话语体系中,自然灾害与“天”相联系,统治与“天”相联系,三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互动的解释,并在政治生活中不时以极具仪式感的话语和现象出现。

历史具有连续性,人们的思想转变更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往往不受某些重大历史节点的影响。即使人们对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对救灾的行为效果与社会秩序变化的关系之认识,依然沿袭着传统意味。如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在《致满清政府电》中痛斥清政府吏治腐败,

认为其“以致水旱迭臻,彗星示警,祸乱无已,盗贼纵横,天人之向背,不待智者而后辨也”^[4]。姑且不论其他,这里依然有着强烈的“天象示警”意味,激烈的革命运动也很难将传统认知断然“割裂”。所以,尽管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但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改变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旦条件适合,灾异思想就会出现”^[5],人们内心原有的某些东西还是会被激发出来。或者也可以说,救灾思想在数千年的习惯中“进入”了近代,而且仍然保留着那些带有标识性的“习惯”。

2. 传统救灾思想的困境

当“习惯”遇到“变化”时,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变化回应变化?事实上,历史现象不能简单地以前进或倒退进行概括。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之剧烈超过了传统社会的任一时期,这是救灾思想的现实环境并使其在某种意义上陷入了困境。当然,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很重要,但不能因此忽略了自然界的活动和规律。所以,一方面必须考虑自然灾害频发的现实。长期以来自然界的内部变异,包括与人类社会的交互所引起的影响,使得近代自然环境变化极其复杂,导致自然灾害接连不断,甚至出现了通常所说的“清末自然灾害群发期”,“灾民遍野,道殣相望,几乎成为近代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6]。水灾、旱灾、风灾、蝗灾、火灾、地震等各种灾害接踵而至,不用说“丁戊奇荒”这种触目惊心的特大灾害,仅以京师附近的永定河为例,“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清王朝灭亡的71年间,永定河发生漫决33次,平均接近两年一次”^[7]。灾害频次急剧增加,交相叠加,持续时间显著增长,波及范围明显扩大,群发性、多样性、长期性等特征明显,发生频率与激烈程度极为罕见。“十年倒有九年荒”,严重的自然灾害强烈且持续地冲击着本已孱弱的防灾救灾防线,也对救灾思想的回应提出了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需要聚焦近代的社会环境巨变。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进入“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传统上多以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视角对此进行观察,但如果以灾害视角审视的话,充分注意到自然灾害与此时复杂形势的互动,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历史情境中进行思考。进而言之,时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然灾害或者救灾思想需要以多维视角来关注其所具有的影响。以政治视角为例,“饥民、流民、游民的数量往往是检测一个王朝或政府稳定程度的晴雨表”^[8],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社会动荡之间往

往只有一线之隔。清政府因循历代救灾思想,始终注意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去防灾救灾。如1910年6月,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奏折中说:“皖北素称强悍,连年复苦荒歉,伏莽时虞,自非思患预防,层节部署,不足以绸缪未雨,定变仓促。”^[9]封建统治阶级将救灾视作特殊的政治工具,革命党人有着目的不同但逻辑类似的诉求,利用自然灾害及救灾揭露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传播革命思想,试图为其政治诉求寻求合法性依据。如有人认为萍浏醴起义的原因在于“是年中国中部凶荒”,不少地方“陷于饥馑”^[10]。严复在致《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的信里说,武昌起义成功的重要原因是“近几年来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11]。自然灾害是环境危机与社会危机共同作用的产物,天灾人祸往往如影随形,传统救灾思想在近代的“大变局”中遇到了新问题,现实对理论的演变提出了要求。

作为一个数千年来有着自身独特历史文化内涵与运行机制的古老国家,在近代工业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从内到外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又必须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社会经济土壤中,这进一步凸显了救灾思想因时而变的重要性。进一步说,自然灾害的频繁暴发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对任何层面的理论与实践皆会产生重要影响,更勿论最直接的救灾思想。也就是说,仍以巨大惯性出现的救灾思想,在面对巨大变化中的客观世界时,如何以变化应对变化,是一项反映着时代主题与社会环境的重大课题。

二、救灾思想在近代的演变

历史叙事中那些激烈复杂的社会大变局,其中的重要节点与自然界发生复杂异常的交织后,有时会以自然灾害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提醒,自然灾害以及救灾不仅仅是近代社会变局中的一项内容,更应该是一个有着背景色彩的时代缩影。近代中国的复杂环境与语境,是救灾思想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现实,并在“过山车”般的变化中陷入了某种困境。但从另一角度上说,救灾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中极具特质与风格的内容,在不确定性中蕴含着独特的规律性,也使得这种困境并未演化成绝境,而是在柳暗花明中发生了带有趋势性的演变。

1. 自然灾害认识的科学化

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

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社会生活状况以及自然环境面貌等多种因素相关联的,有一个从“无知”到“认知”的发展过程。当人们无法解释变化莫测的自然界现象,且这些现象的难以理解不仅仅是超出了知识的范畴时,往往被归因于“上天”对人类社会不敬天、不畏天、不惧天等言行的警告与惩罚,于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悲天悯人、天人相感等出现在救灾思想的话语体系中,“敬天畏命”的“天命观”长时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认识,“天象示警”也成了代表性的解释概念。

这也正如恩格斯所提醒人们注意的某些“观念”：“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12]这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反思近代以来人们关于自然灾害以及救灾思想的认识。也就是说,在鸦片战争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尽管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囿于传统思维,但是部分较“先进的人”已经开始了某种程度上具有新意的思考。特别是在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接触中,中国知识界的救灾思想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局动荡不已,新旧思潮虽纷繁复杂,但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纷至沓来,中国知识界开始以科学视角揭开长期笼罩在自然灾害上的神秘面纱,转型中的社会影响着人们多方面的认知。正如1912年,孙中山在接受《大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的:“一俟各路告成,则货物流通,苦乐可均,而饥馑之灾亦可免矣。”^[13]³⁸⁶这里已然蕴含着他对道路、物资、人员、信息等多种元素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时代主题对救灾思想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

当然,作为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对“天灾”与“人祸”因果关系的认识,既是清末知识界科学知识素养提高的反映,又是他个人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也就是说,救灾不仅意味着和“天”斗争,更是需要祛除“人祸”,这似乎成为革命派的一种革命逻辑。这是当时历史大背景的映照,民族危机在催生民族意识的觉醒中促使着民族主义的高涨,救灾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维系的关系,更是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存亡紧密地联系起来。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近代学科知识体系的传播,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与认知,对救灾思想的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1931年8月,江淮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申报》在评论

中呼吁:“自近世以来,人类文明日臻发达,凡兹灾祸之根因及其预防之方法,都已为文明国家所共知,并积极致力以科学之方法补救预防自然界之灾患。”^[14]文明、科学等词汇在关于自然灾害的报道和描述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人们认识上科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概而言之,近代救灾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灾害认识的逐渐科学化是一个显著特征。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生命共同体。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人与国家、社会以及自然的关系有了重新界定,尤其是“救灾”与“救国”在国家观念兴起的过程中发生了从内到外的联动,成为动员人们救亡图存的内在驱动。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这种“科学认识”还主要是受西方近代工业化语境的影响,基于人、社会、自然多层面互动的救灾思想形成还需要时间。但正因为自然灾害的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救灾思想的历史考察必须注意“非人文化”的传统习惯,反对“非自然化”与“非人文化”两种极端倾向,进而突出问题思考上的人文倾向。

2. 救灾主体的多元化

传统救灾思想中,多以官方为救灾主体的解释与思考,对其他救灾力量往往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既与救灾的实践有关,又与王朝治理中的惯性思维有关,视野、格局、利益等均影响着人们的判断与认知。近代以来,救灾思想在概念、内涵与体系等方面的变化影响着人们对救灾主体的理解,官方的组织领导、社会组织的主动作为、个体的积极响应以及西方力量的参与建构起救灾主体的多元化网络,反映着救灾的多样性诉求,救灾活动呈现出蕴含着新兴意味的复线发展面相。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官方与民间的二重奏。

清政府防灾救灾能力虽然有了日渐下降的迹象,但官方在思想、话语、政策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需要指出,救灾活动开始挣脱传统的羁绊以及地域、行业、身份的藩篱,发生了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变化,如一些官员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兼具了“官”与“商”的背景,在救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盛宣怀即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宣怀档案”中部分赈灾文献的不完全统计为例,1874—1876年在天津直隶筹赈局时,盛宣怀从事10次赈务活动;1886—1892年在登莱青兵备道任上,他参与山东赈抚总局烟台分局赈务

活动9次;1892—1896年在津海关道任上,盛宣怀从事8次赈务活动;1897—1911年,他从事赈灾活动25次;1912—1916年,他从事赈灾活动10次^[15]。盛宣怀发起创办的广仁堂、愚斋义庄等机构,也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官方救灾中存在的问题,在思想更为开放、信息更为流通的环境中更多地暴露出来。《从征别记》中记录了刘侃到唐山后的一段耳闻目见,“然乐亭、滦州有一村人口仅存十三四者,盖三年水患,播种无收,官吏贪征粮税,隐匿不报,致奇穷无补救也”^[16]。日趋困顿的清政府财政在救灾中渐已力不从心,腐败的吏治又侵蚀着救灾者的种种努力。正所谓“天既灾于前,官复厄于后”^[17]，“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在救灾中问题的不断暴露使其形象受损严重。

同时,民间救灾愈益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绅商阶层,他们身上具有以往少有的社会意识以及由此而生的责任感。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救灾活动的组织性越来越强,这种变化通过一些机构的设立与运行反映明显。例如,郑观应等人创办的协赈公所、筹赈公所、义赈公所等机构在救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盛宣怀有着更清晰的回忆:“查前清光绪二、四年,山西、直隶等省旱灾,赤地千里。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等,慨然以救济为己任,筹款选人,分头出发,是为开办义赈之始。”^[18]同时,一些带有文化娱乐性质的义演活动,也丰富了民间救灾的内容与形式,如1877年4月26日的《申报》上登载了上海鹤鸣戏园的一则布告:“从本月十五日起,至端午日止,每日所得戏资,除去房租、火食外,各伶人皆不取辛工,所有余银愿为山东赈款。”^[19]这些义演活动主题鲜明、内容充实、立意明确,在有意为之之中达到了“有形”与“无形”的救灾效果,反映与推动着救灾思想的演变。进入20世纪后,民间救灾不断发展,特别是1921年底成立的带有一定国际性色彩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其章程、机构、人事、活动等均呈现出近代救灾思想嬗变的特点。必须指出的是,此时的民间救灾不同于传统义赈,其组织性、群众性、制度性的色彩已经较为明显。当然,民间救灾完全与政府毫无关系是不可能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影响,甚至需要某种程度的“保护”。

救灾主体的多元化其实质上还是救灾思想在变局中嬗变的表现。当然,此时的多元化尚存在理论与实践等层面上的张力。也就是说,理论上人们对

救灾各主体的性质、特征、作用等尚未深刻认识,实践上救灾各主体交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又乏善可陈。但无论如何,这种官方与民间、本土与西方的相继“发力”是一种令人鼓舞的现象。

3. 救灾措施的系统化

正如前文反复提及的,自然灾害往往被人们下意识地认为只是自然界的某种严重异变,进而给自然界本身和人类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但显然,这是一种主要基于现象的因果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类社会活动在“因”上的作用。也就是说,自然灾害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相互作用中发生的极端事件或过程,自然灾害的危害大小,既与自然界内部的异变程度紧密相关,又与人类社会与之相关联的变化程度紧密相关,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周而复始作用的结果。在这其中,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的社会系统频繁往复,各自系统内部又演化复杂,规定与要求着救灾思想的系统化特质。

但是,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系统特质表现并不强,例如救灾主体往往各行其是,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不多,救灾措施也是各不相同,即使有着一些系统化的表现,也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内涵上的思考与逻辑上的互动。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没有以系统思维来观察自然灾害。近代以来,社会变动中知识、技术、组织等的变化影响着人们对自然灾害与救灾思想的观感,系统思维的影响愈益明显。如郑观应关于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逻辑思考极具代表性:“自粤、捻构乱,燕、齐、晋、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水旱频仍,半由于此。”^[20]745“粤捻构乱”“树木斩伐”与“水旱频仍”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稳定”“植树造林”与“水旱无虞”之间的联系。这在以慈善闻名的绅商经元善那里也有着类似认识:“不办河工,放赈是无底之壑,久而久之,难以图存。”^[21]作为生活在社会大变迁中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能够在变局中有此明确的思考,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救灾思想趋势性的变化。

在更具现代意识的人那里,对此的认识尤为深刻。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孙中山勾勒着未来图景:“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22]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综合考虑救灾,是革命党人在政治运动中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构想,也是其救灾思想系统思维的

特色反映。例如,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对如何以制度保障“构想”深有体会,所以其在1912年《咨参议院请核议暂行传染病预防法草案文》中建议:“查传染病发生甚易,传播至速,亟应制订预防法规,俾有司实力奉行,人民知所防范。该部所称,实为卫生行政最要之举。”^[13]281尽管这里谈的是疫病的公共危机,但孙中山的思考反映的却是系统思维,彰显着救灾思想的嬗变。再如,以孙中山为正长、黄兴为副长的“救灾义勇军”组织,尽管在政局动荡中难有大作为,但其领导的近代军队在救灾模式上的尝试,透射出的则是新鲜气息。

救灾措施的系统化,反映的不仅仅是人们以全局观念和整体思维来考虑救灾,同样也是从防灾救灾一体化的视角来尝试与自然灾害“相处”。近代社会大变局为此提供了社会环境,如何系统地救“已成”与“未成”之灾,在救灾群体中出现了富有趋向的思考与行为。

三、救灾思想传承与演变的内在逻辑

救灾思想在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着长期以来形成发展中积累的的内涵与特质,又有着社会大变迁所赋予的复杂而新奇的元素,反映着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互动进入一种新的状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3]。这也提醒,必须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在传统与近代、历史与现实的融通中观察救灾思想的传承与演变,方能更深刻把握其中的内在逻辑。

1. 社会变迁的决定性

近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决定着救灾思想的嬗变,同时,救灾思想影响着社会的变动并反映着这种变动的轨迹及规律。这种历史情境中的互动性是深入考察与思考近代救灾思想的重要着力点。简言之,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了看似局部但实则影响深远的冲击,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这种变动中发生了具有趋势性的思想变化,关乎着对救灾思想的思考。“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在其40余年的为官生涯中始终秉承着民本思想,“倘通盘筹画,有可暂纾民力之处,总求恩出自上,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24],其忠君思想中渗透的“民惟邦本”思想影响着其救灾观念,倡捐、煮赈、资送、留养、收孩、瘞棺、捐衣、劝糴、养佃、典牛、借籽种、禁烧锅等建议已初见其系统性的救灾主张。

到了以“自强”“求富”为号召的洋务运动时,洋务派在对传统救灾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开始从自然以及社会等方面综合探究自然灾害的成因,探索行之有效的救灾措施,救灾思想上有了较大变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皆提出过有着一定价值的救灾主张,其中郑观应的思考尤其具有代表性。郑观应从自然、社会以及国际国内等多方面分析自然灾害的成因,进而从建立制度、选拔人才、发展慈善、保护环境、民众自救等多层面阐述了其防灾救灾的主张,特别是其“夫降灾自天,而弭灾则在人。天之降灾,人不得而禁之。人之弭灾,天亦不得而特之”^[20]³⁰的观点,尽管依然有着自身与时代的局限,但已反映其救灾思想滋生出的现代性元素。这也提醒,中国早期现代化在社会转型的阵痛期中艰难踟蹰、踟蹰而行,传统社会结构与阶层的裂变和整合是时代的大背景,身在其中的救灾思想“感同身受”。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们救亡图存的热情不断高涨,各种救国思潮纷乱复杂。其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救国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并由此推动了救灾思想的再演变,救灾思想呈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特色。一方面是此时的救灾思想越来越深刻注意到人类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对自然灾害的影响,“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原因在于“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25]。另一方面是将自然灾害与政治进行了更紧密的联系。孙中山在谈到自然灾害时,很多时候下意识地将其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说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导致“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26]²¹,所以“驱除鞑虏”自然是应有之义,救灾也被赋予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并逐渐影响着社会的认知与人们的观念。1920年,晋、冀、鲁、豫、陕五省发生了极为严重的旱灾,舆论多是“非特救同胞于水火,而且救国家于危亡”^[27]的呼声。总而言之,救灾思想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发展演变的,社会的性质与发展程度决定着救灾思想的内涵与特征。

2. 中西之间的碰撞与交融

人们常常认为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较为严重,而轻视其对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在外交方面。近代中国的大背景是西方列强不断加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反帝的呼声与抗

争此起彼伏。尽管中西思想文化有着交汇与融合,但碰撞与冲突始终是更为突出的存在。而就在其中,救灾活动中也有着这种充满张力的表现,并赋予了救灾思想新的气息。

西方参与中国的救灾活动,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在“丁戊奇荒”时。“丁戊奇荒”发生之际,通过商人、传教士、驻华外交人员以及其他渠道,西方社会给予了极大关注。无所谓者有之,好奇者有之,担心者有之,同情者有之,也有以实际行动真正实施援助者。如美国众议院尽管在是否将“中国赔款退还用于救灾”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但还是在纽约和香港分别设立了接受捐款的机构,并开始了实际的捐助活动。当然,最突出的还是西方传教士对救灾活动的参与。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是基于多种目的的,例如,“我向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28],他们通过募捐、解款、放赈等方式表达着“慈善心意”。对此,中国官方与民间的赞同、支持、保护、反对、破坏等各种反应纠缠在一起,可以说西方的救灾活动是在一种“纠结”的氛围中进行的。必须承认的是,西方在救灾的思想、制度、措施等方面确实有着值得借鉴之处,如英国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摆脱饥荒的困扰,既“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决策,也与社会各阶层的努力、追求知识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29]。所以客观地说,西方一些力量不仅在救灾活动中发挥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理念上引发了人们一些“新”的思考。

同时,中国此时对西方的自然灾害也有关注,这种关注有着两方面的前提或者背景。一方面是中国的救灾思想正处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中,自身尚不成熟,对国际救灾活动也有个了解的过程,包括信息、机构、制度、人员等皆需要调整与适应。另一方面是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皆造成了重大伤害,若“以德报怨”对其公开救灾,国人如何克服思想感情上的障碍是个现实问题。当然,即使有着如此这般的观念与现实问题,中国还是尽可能地在对外救灾上进行了努力。1906年4月18日,美国旧金山发生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将两万两银“汇寄灾区,从事抚恤”^[30]。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申报》评论文章呼吁“救灾恤邻为其无上之义务也”^[31]。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动荡状况,特别是在西方列强不断进行侵略活动的前提下,这属实不易。孙中山以政治家的眼光,更是认为对外救灾的

“功效尤胜于外交家提倡联络中美谈判经年也”^[32]。近代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充满着太多难以言明的沉重,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与气质,使得“救灾恤邻,另是一事,不能牵混”^[33]的类似理念,在对外的救灾活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3. 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人类与自然界的相处始终处于一种变动之中,“人类无法征服自然,更无法强行战胜自然。二者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34]。尤其是对有着丰富思想感情的人类而言,其对自然界的敬畏、了解、征服等最终要归于尊重,这也意味着要尊重自然界的每一部分,当然包括自然灾害。如果说,人类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也是向其“学习”的过程,那么救灾思想的变化意味着思想文化、社会规范、治理模式等的不断调整。近世以来,救灾思想传统内涵的赓续与现代外延的渐变结合在一起,在碰撞交融中呈现出并行的奇特景象。

客观地说,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清朝的救灾制度已经较为“齐备”,例如凡一地受灾时皆需要“经报灾、勘灾、审户,最后才是蠲免与赈济”^[35]。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近代“几乎是无年不灾,无灾不烈”^[36],对传统环环相扣的程序性救灾模式提出了挑战。实际上,自然灾害形成、暴发进而向人类社会扩散是一个过程,这使得人们的防灾与救灾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机会。进而言之,人类和人类社会尽管是自然灾害的承载体,但不应束手无策或消极应对,而应该积极预防和未雨绸缪。所以,必须跳出就灾论灾的框架和逻辑来考察近代救灾思想,发现其所处的社会变局的历史特质,观察其如何在除旧布新中呈现新旧杂糅的面相。

特别要言明的是,救灾的主动性不仅仅单独就救灾而论,而是要以整体观念思考如何与自然灾害“相处”,进而建构防灾救灾一体的思想体系。这种认识自然需要以较长时段的思维进行审视,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那里,或明显地表现出来,或在有意无意中体现出趋势性的东西。如清政府官员的感慨“是民非困于灾,直困于贪吏之苛敛也”^[37],这虽然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有感而发,但却是将救灾与社会秩序相联系,并且从此后的救灾实践看,防灾救灾的一体化思维已经有所显现。而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认为清政府及官员的“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26]89},因此“政府常为人民谋幸福,有灾害则为之防,有利益则为之图,故人民能家给人足”^[38],表现出在革命运动中将救灾政治化

的诉求。姑且不论政治因素,仅从技术层面考虑,这也涉及如何主动防灾救灾的思考。

当然,这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无疑是需要“时间”的。这既指过程意义上的时间,也指视角意义上的时间。以长时段视角审视,那些以人为中心且引起极大社会反响的事件或者活动总是以较多笔墨记录于史,但人与自然的交往除了“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带有极强寓意的传说外往往不易觉察。也就是说,自然灾害所具有的规律注定其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从短时间看,自然灾害具有不规则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意味着,随着近代以来对自然灾害及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进一步了解,人们逐渐意识到救灾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救灾思想是一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多种因素的思想体系,人们在救灾中的主动性也变得越来越强。

近代救灾思想的变化是多方面综合的反映,最重要的还是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大变迁紧密相连。一方面,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犹在挣扎,小农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传统文化在社会的影响全面且巨大;另一方面,西风东渐引起的浪潮风起云涌,近代化意义的萌芽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发生着。当然,这引发的主要还是人们在知识和技术层面的反思,因此由旧趋新的嬗变注定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旧与新掺杂在一起,决定了救灾思想在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中经历着阵痛,特别突出的是具有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特质的元素出现且发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简而言之,救灾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时间空间相叠加的体系。所以,闭关锁国、拒绝变革无路可走,亦步亦趋、全盘西化也走不通,只有在传承传统救灾思想优秀因子的基础上对西方救灾思想中的合理化内容进行本土化改造,始终围绕着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这个主题,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救灾思想。

注释

①相关代表性研究见以下论文: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夏明方:《略论洋务派对传统灾异观的批判与利用》,《中州学刊》2002年第1期。朱浒:《近代中国的灾荒与社会变局》,《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高中华:《试论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荒实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1]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7.
-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01.

- [3]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4]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5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51.
- [5] 徐凤先.中国古代的异常天象观[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3):201-208.
- [6]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谨:1840—191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
- [7] 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J].近代史研究,1990(5):4-25.
- [8] 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2.
-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261.
- [10] 赵恒烈,徐锡祺.中国历史资料选:近代部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212.
- [11] 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M].刘桂梁,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782.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74.
- [1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4] 淫雨之祸[N].申报,1931-07-25(10).
- [15] 冯金牛,高洪兴.“盛宣怀档案”中的中国近代灾赈史料[J].清史研究,2000(3):94-100.
- [16] 戚其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201.
- [17] 刘运祺.辛亥革命诗词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0:215.
- [18] 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盛宣怀未刊信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0:257.
- [19] 戏资赈饥[N].申报,1877-04-26(2).
- [20]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21] 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7.
- [22]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25.
-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74.
- [24]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林则徐集·奏稿: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2.
- [25]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407.
- [26]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7] 恨生.说明筹款救灾的真意[N].申报,1920-11-05(17).
- [28]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李宪堂,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86.
- [29] 冯雅琼.近代早期英国救荒知识的产生及传播:以乡绅为主体的考察[J].世界历史,2019(4):78-93.
- [30]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452.
- [31] 抱一.吾国民对于日本大劫之态度[N].申报,1923-09-05(4).
- [32] 郝盛潮.孙中山集外集补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17.
- [33] 皖垣救济日灾与检货问题[N].申报,1923-09-18(7).
- [34] 崔思朋.河流伦理话语构建的理与路:基于古代中国的黄河治理与黄河文明[J].管子学刊,2024(4):85-109.
- [35]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23.
- [36] 李文海,程啸,刘仰东,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
- [37]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3632.
- [38] 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506.

On the Evolution of Disaster Relief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Liu Jianmi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 modern disaster relief thought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ing the complex process of modern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from a distinctive perspective. Modern disaster relief thought was nurtured and inherited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spanning thousands of years, but in the great changes of modern times, it fell into a certain predicament and was forced to start an evolution with modern characteristics. This “forced evolution”,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ing its survival, stimulated more and more initiative, which was manifested in the certain degree of replacement of old with new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disaster relief, the subjects of disaster relief, and the measures for disaster relief. Disaster relief thought began a slow but far-reaching evolution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a series of in-depth issues. That is to say, rooted in the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local and the Western, and theory and practice, modern disaster relief thought carried out a certain depth of thinking on how to striv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people’s liberation, and realize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people’s happ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relief, writing a chapter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lorful historical picture of modern times.

Key words: disaster relief thought; modern China; modernity

责任编辑:王 轲